

里赞代表： 检察实践为立法变革奠定重要基础



本报讯(记者史兆琨 见习记者郭荣 常瑞倩)“近年来,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既抓末端、治已病,更抓前端、治未病,上下求索,大胆创新,诸多可圈可点的实践探索不断破解着社会治理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四川省成都市政协副主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里赞对司法体制改革以来检察机关的诉源治理实践作出高度评价。

里赞对记者说:“经两反转表和内设机构改革,检察机关的检察权被重新定位和理解,由以往‘重刑轻民、重刑轻行’向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齐头并进转变。理念一新天地宽,检察机关积极发挥检察职能创新社会治理,在公益诉讼、未成年人保护等诸多方面开展了试点性的改革工作,还推动了立法司法的进步。”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检察机关探索实践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2021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将检察机关会同教育部、公安部等建立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制度写入法律。

“这些探索和改革值得肯定,充分展现了检察机关的责任与担当。”里赞谈到,当前检察机关社会治理的脚步越来越稳、越来越实,与此相对的是立法和顶层设计的相对滞后,这会导致检察机关在社会治理中面临无法可依、无例可循的局面,因此,需要在立法上予以明确。“检察机关的探索实践已经为诉讼体制、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基础条件,现在需要做的是及时总结归纳,推动相关立法。”里赞表示。

全国两会·在现场



次仁措旦、泽仁永宗、米玛国吉、格桑德吉(从左至右)四位西藏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在会议间隙就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交流。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桂东县江镇光明村党支部书记郭小芹建议,加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的营商环境,让人才和产业在乡村扎根。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定远县吴圩镇九梓村党总支书记王萌萌(右一)建议从党建、资源、人才、产业等方面,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长效发展机制。

谢津秋代表： 做好养老金统筹惠及民生



本报讯(记者杨璐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委员、天津市审计局一级巡视员谢津秋非常关注养老问题,她提出做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策衔接的建议。

根据国家部署,从2022年1月开始,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在全国范围内对地区间养老保险基金当期余缺进行调剂,用于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在此时间节点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举措之一,体现了国家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的决心。”谢津秋表示。

如何有序稳步推进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谢津秋认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并不是简单的基金统筹支问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涉及每一名参保人员利益,涉及社会稳定。她建议统一规范各地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全国统筹。在国家系统统筹谋划中,尽快明确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策与地方政策差异的解决办法;各省市政府提前做好地方政策与国家政策对接预案,协调人社、财政等相关单位,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及政策差异过渡、衔接工作,提前测算政策差异对地方影响,做好地方财政资金足额预留,平稳有序推进制度落实,全力保障基本民生。

本报讯(记者谢文英) 如何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起权益防护网,是全国政协委员们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皮剑龙近年一直为外卖小哥等新兴平台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发声。他通过走访调研,先后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加大“三新”就业群体劳动经济权益保障》《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亟待加强》等提案。今年全国两会,他带来《关于尽快修改劳动法,对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进行专章规定》的提案。

“劳动法调整的是劳动关系,如果劳动者的身份问题不解决,劳动关系的界定就是模糊的。”皮剑龙说,新兴平台就业群体劳动合同签订率普遍较低,这使得劳动者维权困难。他关注到2021年度中国社会学十大影响力事例中的一个外卖小哥的案



皮剑龙委员



孙洁委员



吕国泉委员

例:外卖小哥在配送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以工伤为由向用人单位索赔。当地仲裁委裁决确认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后,用人单位却以外卖小哥是个体工商户为由提起诉讼,否认两者间存在劳动关系。

“个体工商户是经营主体,不再是自然人,这会让外卖小哥直接丧失劳动者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借此规避劳动关系。”皮

剑龙对这种现象表示担忧。令人庆幸的是,苏州劳动法庭没有支持该公司的诉请,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这个案例对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是很好的司法指引。”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孙洁也注意到外卖小哥“被个体户化”现象,并对此进行深入调研。基于平台、代理商、从业者

三方关系复杂多变的特点,孙洁提出,“将社会保障与传统标准劳动关系‘解绑’,是解决平台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的关键。”她建议,把劳动者权益保护作为重点,淡化劳动关系认定。

孙洁说,“在加强平台就业管理方面,既要防止过度干预,忽略新业态的灵活多样性,强制要求建立劳动关系,又要防止放任自治,忽略新业态从业者

结构性的弱势地位,这两种做法都不利于平台经济的发展和劳动者的保护。”

中华全国总工会界别今年提交的大会发言,也聚焦外卖小哥等新兴平台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说,新兴平台就业群体是我国产业工人队伍的协作组成部分,维护好他们的劳动权益,事关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他建议立法机关修改完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明确劳动者、劳动就业群体等基本概念,为新兴平台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建立国家层面的协作联动机制,确保政策法律的落实,齐心协力、多措并举地为新业态劳动者筑起权益防护网,让新业态劳动者越来越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刘忠代表： 防治结合,守护“头顶上的安全”



本报讯(记者杨璐嘉) “近年来,全国各地高空抛物伤人事件时有发生,高空抛物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凌峰航空液压机有限公司航空工业首席技能专家刘忠接受采访时说,高空抛物入刑一年来,一系列高空抛物案件得到公正裁决,有力维护了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尽管法律上对高空抛物罪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具体司法实践仍面临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由于缺少防高空抛物的监控设备,往往找不到抛物的‘肇事者’。”刘忠说。

“高空抛物入刑后,检察机关应当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整理发布典型案例,让更多人认识到高空抛物的危害性以及可能会承担的法律后果,让更多人明白高空抛物不仅害人还会害己,力争从源头上杜绝或者减少高空抛物。”刘忠建议,除此之外,检察机关应当发挥公益诉讼作用,强化诉源治理,积极探索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发出检察建议,联合相关政府部门、物业公司、业委会、社区街道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头顶上的安全”。



周松勃代表



郭成宇代表

本报讯(记者史兆琨) 近年来,我国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呈逐年下降态势,禁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然而,有些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被用于毒品犯罪,危害性较大。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

涿州范阳医院院长周松勃,全国人大代表、齐齐哈尔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郭成宇建议,提升麻醉和精神药品涉毒犯罪打击能力,推进综合治理、依法治理。

周松勃、郭成宇代表： 提升麻醉和精神药品涉毒犯罪打击能力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是国家法律法规严格管控的药品,需要通过正规医疗途径凭处方等才能获得。除了医疗等合法目的,以其他目的进行贩卖的行为都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本身的药物属性以及网络化的购买方式,为打击该类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带来诸多难题。”周松勃表示。

如何推进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涉毒犯罪的综合治理、依法治理?郭成宇认为,要坚决遏制由药品滥用引发的涉毒犯罪增长趋势,深化打防管控各项措施,有关部门要加强联合执法司法。齐抓共管,防止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品非法流通。司法机关要做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分化瓦解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涉毒犯罪链条,建议检察机关通过办理涉毒案件有针对性地提出检察建议,推进社会治理。

“建议探索构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开具和使用环节的数字化平台,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推进医疗场所工作平台联网、电子病历等。在平台及产品的设计方面,可对需要长期门诊使用相关药品的慢性病患者重点关注,并设置相应约束手段;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处方用量和处方频次进行线上预警,有效避免同一患者在多个医疗机构或同一医疗机构不

同部门重复获取药品,特别是要注重乡村联网。同时,也要提升相关涉毒犯罪打击能力,推动出台相应的司法适用标准。”周松勃建议。

加强中医药产业开展法治培训,是郭成宇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我建议推动建立涉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行业人员法治培训体系,把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相关规定内容融入到人职考试、职称评定等过程中。建立病患及家属的全面告知制度、医疗场所成瘾性应急预案等,比如,患者需长期服用或有成瘾迹象,医疗工作人员等应及时向病患家属提供脱瘾康复治疗,并制定相应计划。”

李大进委员：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充分发挥律师作用



本报讯(记者谢文英) 全国政协委员、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在一份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提案中,建议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案时要充分发挥律师的积极作用,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

建立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一项重要改革部署。该制度实施以来,整体运行顺畅,优越性明显。但是,由于该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李大进直言,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意就是在控辩双方平等交流的基础上,鼓励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从而有效实现案件繁简分流,简案快办,疑案精审。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现行法律并没有要求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通知律师,律师往往介入案件较晚,在审查起诉阶段不能充分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从而导致被追诉人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产生顾虑,影响该制度的适用。

李大进建议,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和法律的明确规定出发,建立此项制度的实施细则,凡符合条件就应该适用;建立充分听取律师意见的机制,充分发挥律师在配合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积极作用,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案件办理中发挥促高效、保公正、提质量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杨璐嘉 白鸣) “近年来,网络犯罪案件数量逐年大幅上升,已经形成一个门类齐全、分工明确、协作紧密的网络黑色产业链。该链条中,非法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是重要一环。”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银接受采访时说。今年全国两会上,她联合安徽团29位代表提交继续依法严厉打击网络犯罪、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议案。

同样对此问题十分关注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副主任王兆,今年两会她也提交了相关建议,“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是司法机关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要求,也是加强网络

文明和网络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2021年10月,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这是我国首次对打击惩治电信网络诈骗进行专门立法。同年11月起,正式开始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我国首部规范和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性法律,构建了权责明确、保护有效、利用规范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给个人信息上上了一把法律“安全锁”。

检察机关积极落实司法责任,持续加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打击力度。2021年,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9800余人,同比上升64%;起诉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内

陈建银、王兆代表： 惩治网络犯罪与保护个人信息协同推进



陈建银代表



王兆代表

鬼”500余人,涉及通信、银行、保险等多个行业;结合司法办案开展诉源治理,向工信部制发“六号检察建议”,强化个人信息源头保护。

“我关注到,目前起诉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人数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数依然有较

大差距,对于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缺乏针对性治理。同时,网络平台通过App收集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后往往忽视安全防护,导致个人信息被窃取、泄露和滥用的情况屡屡发生。”王兆谈起目前存在的问题。

对此,陈建银建议检察机关“一案双查”,将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纳入打击治理网络犯罪中部署推进,在查办下游网络犯罪的时候,溯源上游个人信息泄露的渠道和人员,同步加强全链条打击,加大对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处罚力度。此外,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双向合力,对于重大案件探索建立联合办案组,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源头治理。

“强化源头预防,持续深化行业教育和社会警示也非常重要。检察机关要发挥‘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行业和企业开展以案释法,曝光重大典型案例,形成警示效应。”王兆建议。